

代序

治學遊藝七十春

——賀饒宗頤教授「米壽」

| 曾憲通 |

饒宗頤教授乳名福森，字伯濂，又字伯子、固庵，號選堂，是海內外著名的史學家、經學家、考古學家、古文字學家、文學家和書畫家，又是出色的翻譯家。香港大學、香港嶺南大學、香港公開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和香港科技大學名譽文學博士，法國索邦高等研究院首位榮譽人文科學國家博士。歷任印度班達伽東方研究所、法國科學中心、法國遠東學院院士。哈佛大學多次訪問學人。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教授，香港大學中文系教授，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首任教授，耶魯大學、法國高等研究院宗教部客座教授，日本京都大學及人文科學研究所客座教授兼講學九州大學、北海道大學。曾為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偉倫講座教授及中國文化研究所榮譽講座教授、顧問，主持出土文獻研究計劃，香港大學中文系榮譽講座教授。1962年獲法國漢學儒蓮獎，1980年被選為法京亞洲學會榮譽會員，1993年獲法國政府頒授文學藝術勳章。現兼任國內外多間高等學府及學術機構顧問，諮詢委員、名譽教授及研究員。2000年7月作為香港學術界的傑出代表獲香港特首親自頒發的大紫荊勳章。2001年獲聘為北京亞歐科技學院院士，等等。

(一)

選堂先生1917年6月生於廣東潮安。父親饒鏗（純鈞）博學多才，工於詩文，精於考據，尤擅譜志，著有《佛國記疏證》（稿）及《潮州西湖山志》。所建天嘯樓是粵東最負盛名的藏書樓，家藏典籍積至十餘萬卷，是潮州有名的藏書家。選堂先生幼承家學，聰穎過人，詩詞書畫琴藝，初試即露鋒芒，故早享神童之盛譽。16歲咏〈優曇花〉詩，一時驚諸老宿，競與唱和。弱冠之年即為其父整理遺著《潮州藝文志》，刊於《嶺南學報》。1935年至1937年受聘為中山大學廣東通志館專任纂修，1939年8月應聘為中山大學研究員。當年中山大學遷校雲南澂江，先生取道鯊魚涌擬經香港赴滇，因病滯留香港。留港期間為王雲五主編的《中山大詞典》撰古籍篇名提要稿，又助葉恭綽編定《全清詞鈔》初稿，並完成《楚辭地理考》等著述。1941年返回潮州。1943年赴廣西桂林，任無錫國學專科學校教授至1945年，其間兩度深入大瑤山。1946年被聘為廣東文理學院教授。1947年至1948年出任華南大學文史系教授兼主任及《潮州志》總編纂兼廣東省文獻委員會委員。1949年為《潮州志》之編寫赴港諮詢並工作。在此期間，先生著述甚豐。但其時正當日寇侵華之艱難歲月，生活顛沛流離，故積稿多未刊行而散佚殆盡，僅存流寓粵西所作之《瑤山詩集》，殊感可惜！先生早歲見重於顧頡剛教授，由顧老邀約編著新莽史及《古史辨》第八冊（古代地理），均因戰亂未及印出，其目錄載於《責善》半月刊（齊魯大學印行）。

1952年至1968年，先生先後任香港大學中文系講師、高級講師、教授，主講詩經、楚辭、漢魏六朝詩賦、文學批評及老莊等專題。課餘則從事古代文獻的整理和研究。在此期間，先後出版了《楚辭書錄》（1956年）、《楚辭與詞曲音樂》（1958年）、《九龍與宋季史料》（1959年）、《詞籍考》（1963年）、《潮州志匯編》（1965年）、《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善本書錄》（1970年）等。與此同時，先生更注重新發現材料的整理與探究，如《韓江流域史前遺址及其文化》（1950年）、〈從考古學上論繪畫的起源〉、〈長沙楚帛書山鬼圖跋〉、《戰國楚簡箋證》、《隨縣曾侯乙墓鐘磬銘辭研究》、〈居延零簡〉、〈京都藤井氏有鄰館藏敦煌殘卷記略〉、〈金匱室藏楚戈圖案說略〉（1956年）、〈長沙楚墓時占神物圖卷考釋〉、〈帛書解題〉（並1954年）、《敦煌本老子想爾注校箋》（1956年）、《日本所見甲骨錄》、《巴黎所見甲骨錄》（並1956年）、《長沙出土戰國繒書新釋》（1958年）、〈海外甲骨錄遺〉、《殷代貞卜人物通考》（並1959年）等等。這一時期，先生對敦煌學、甲骨學、楚帛書用力最勤，創獲良多。如《敦煌本老子想爾注校箋》考定《想爾注》成於張魯之手而託始於張陵，對道教史研究有重要意義，它引起歐洲人對道教研究的興趣，成為後來漢學界之道教狂熱。此書在國際上負有盛譽，被巴黎研究院定為教材。《殷代貞卜人物通考》開創了以貞人為綱排比卜辭的先例，在理論和方法上都超越前人，對了解各個貞人的占卜內容及其所屬的時代很有參考價值。此書一出，共有十三個國家

和地區發表評論並加以推介，足見它在中外學術界影響至鉅。先生在《殷代貞卜人物通考》一書刊出之後，與印度友人白春暉（V.V. Paranjape）交換，從其學梵文三年；1963年，遂應班達伽（Bhandarkar）東方研究所之聘，前往天竺古梵文研究中心之浦那（Poona），從事中印關係之研究。復從 V.G. Paranjape 老教授學習梨俱吠陀（*Rig-veda*），足跡遍及印度南北。歸途遊歷錫蘭、緬甸、泰國、柬埔寨各地，所到之處，尋幽搜秘，別有《佛國集》紀遊。先生後來從事「東方學」研究，其梵學知識即植根於此。1965年，先生在紐約楚帛書藏主戴潤齋處獲睹帛書原物，積疑冰釋，因寫成〈楚繒書十二月名覈論〉（1965年），證成帛書圖像首字即《爾雅·釋天》十二月名，遂成定論；又據楚帛書紅外線照片作〈楚繒書之摹本及圖像——三首神、肥遺及印度古神話之比較〉及〈楚繒書疏證〉（並1968年），把楚帛書研究推向新的階段。

1968年至1973年，選堂先生應新加坡國立大學之聘，任該校中文系首任教授兼系主任。教學之餘，先生專事搜求當地華文碑刻，〈星馬華文碑刻繫年〉（1972年）和《新加坡古事記》二書，為華僑史研究增添了極其珍貴的資料。還刊行《歐美亞所見甲骨錄存》（1970年）。前度在法京與法國漢學大師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教授合著《敦煌曲》（於1978年在巴黎出版），為敦煌寫卷詞曲之集大成者，在敦煌學研究上具有特殊的意義。選堂先生對敦煌卷子十分重視，並用以進行多方面的研究。除上述

《想爾注校箋》外，尚有不少專論，多有發明。如從敦煌《通韻》中對四個梵文字母（Ṛ、R、Ḷ、L）的不同譯法，研究唐人作佛教贊歌時的「和聲」；從宋初開寶七年（974）十二月十一日的批命本子，研究七曜與十一曜的關係，闡明了古波斯占星學對中國古天文學的影響，皆發人深省。由於先生曾留學印度梵學研究中心攻治婆羅門經典，通曉梵巴諸語文，因而能夠揭示劉熙《釋名》淵源於婆羅門經《尼盧致論》（*Nirukta*），韓愈《南山詩》實受馬鳴《佛所行贊》（*Buddha-Carita*）的影響。所有這些都是前人未發之覆。先生在新加坡國立大學執教期間，還兩度外出講學，其中1970年至1971年為美國耶魯大學客座教授，1972年至1973年為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教授，均有不少力作。

1973年9月，先生重返香港，任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教授，旋又兼系主任，直到1978年9月退休。這一時期，印行在美國所著《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1977年），在法京巴黎編著之《敦煌白畫》（1978）與《敦煌吐魯番本文選》（2000年）二書，為敦煌學研究增添異彩。過去研究敦煌繪畫的人往往只注意壁畫和絹畫，先生獨具匠心，他將在寫卷中的白描、粉本、畫稿等研究敦煌畫極重要的材料輯出，編成《敦煌白畫》一書，有圖有說，使沙州畫樣的來歷得以闡明，從而填補了敦煌研究中的一項空白，進而融入自己的畫作中，使人物、線條極具獨創性。還出版《黃公望及富春山圖臨本》等，此外尚有大批手稿待刊。1976年先生第三次蒞法京巴黎，在遠東學院工作。除繼續研究敦煌經卷外，還遍讀沙畹當年在華搜集所得的全部金石拓本，遂有《唐

宋墓志：遠東學院藏拓片圖錄》之作。復以暇日從 J. Bottéro 教授治楔形文字，正式接觸西亞文史知識與遺物。先生後來從事比較古文字學的研究即淵源於此。

選堂先生榮休後並未離開教席，繼續在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和澳門東亞大學擔任榮譽教職，並培養研究生。1978年至1979年，在法國高等研究院（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第五組宗教部門任客座教授一年。1980年，任日本京都大學及人文科學研究所客座教授五個月。1980年初冬，先生到成都參加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三屆年會後，即到內地參觀考察。筆者有幸作為廣東省高教局派出的隨員一路陪同。此次歷時三個月，先生行踪遍及14個省市的許多博物館和考古文物單位，飽覽了祖國的名山大川，接觸到大批新出土的考古文物資料，興奮異常。11月中，先生在湖北省博物館參觀，看到展品中有曾侯乙墓出土衣箱漆書20個字的摹本，盡是古文奇字，尚無釋文，不明句讀。譚維泗館長請為試釋，先生經過一番琢磨，終於寫出：「民祀佳坊（房），日辰於維，興歲之四（駟），所尚若陳，經天嘗（常）和」20個字，聞者無不折服。隨後又寫成〈曾侯乙墓匱器漆書文字初釋〉一文，詳加考證，刊於《古文字研究》第十輯（1985年）。在武漢時，先生有感於新出資料的重要，又得到湖北省博物館的支持，便與筆者商定以「楚地出土文獻研究」為課題，回港後即邀筆者共同完成《雲夢秦簡日書研究》（1982年）、《隨縣曾侯乙墓鐘磬銘辭研究》和《楚帛書》（並1985年）三部著作。前二書被譽為研究秦簡日書及振興中國鐘律學的奠基之作；後一

種則是楚帛書出土四十年來最新成果的彙集和全面的總結，對推動楚帛書的研究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實際上，先生榮休之後，由於擺脫了日常行政雜務，更加自由自在地雲遊四海，更能集中精力於學術的探討與著述，故自 80 年代以來，又有多種著作相繼問世，除上面提及之外，還有《唐宋墓志：遠東學院藏拓片圖錄》（1981 年）、《選堂集林·史林》（1982 年）、《虛白齋書畫選》、《敦煌書法叢刊》29 冊（並 1983 年）以及《固庵文錄》（1989 年）等，都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90 年代初期，先生一方面開始着手編纂《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準備對自己的學術研究作一番全盤的清理和總結；一方面仍繼續醉心於開拓新的學術領域，碩果纍纍。舉其要者，如《中印文化關係史論集——悉曇學緒論》（1990 年）、《老子想爾注校證》、《文轍——文學史論集》（上、下）（並 1991 年）、《詞集考——唐五代宋金元編》（1992 年）、《廣濟橋史料彙編》（與張樹人合編著）、《畫顛——國畫史論集》、《梵學集》、《楚地出土文獻三種研究》（與曾憲通合著）、《饒宗頤史學論著選》（以上並 1993 年）、《新加坡古事記》（1994 年）、《新莽簡輯證》、《敦煌漢簡編年考證》（並與李均明合著，1995 年）、《殷代貞卜人物通考》（韓文譯本）、《饒宗頤潮汕地方史論集》（黃挺編）、《澄心論萃》（胡曉明編）、《敦煌曲續論》（並 1996 年）、《文化之旅》（1997 年）、《符號·初文與字母——漢字樹》（1998 年）、《清暉集》（1999 年）、《甲骨文通檢》（主編，共五巨冊，1989 年至 1999 年出齊），另編有《敦煌琵琶譜》（1990 年）、《詞

學秘籍之一——李衛公望江南》、《法藏敦煌書苑精華》。此外還主編《華學》雜誌和主持以地下出土資料補資治通鑒史料之長編稿系列。前者自 1995 年至今已出版十一輯，後者也有多種《出土史料繫年長編》問世，犖犖大觀，在學界深有影響。此一時期，先生雖年逾古稀，依然懷着一顆勇於縋幽鑿險的童心，在諸多領域中不斷地開拓創新，這試舉三例說明之：

《近東開闢史詩》全文用楔形文字刻於七大泥板之上，是一部記載阿克得人開天闢地的神話文獻，上半部記述天地開闢之初諸神之間相互爭鬥，後來才產生出太陽神馬獨克（Marduk）。下半部敘述馬獨克安處宇宙間，由三位最高神明（Anu、En-lil 及 Ea）興建巴比倫神廟的經過，以及他們如何從反叛者身上瀝取血液來創造人類的創世故事。饒先生第一次將這部楔形文字譯為中文，並以書中之宇宙論與《淮南子·天文訓》、彝族宇宙論和古代楚人的天道觀詳細加以比較，進而指出近東和遠東兩個地區開闢神話和造人神話的異同，這在世界比較神話學上具有重大的意義。由於此書饒先生用鏗鏘典雅的文言文翻譯，讀起來韻味無窮，令人叫絕，堪稱翻譯史上之傑作。此書已經由遼寧出版社作為新世紀萬有文庫之一種在內地出版。

《符號·初文與字母——漢字樹》是先生最新的研究成果之一。書中利用考古發現的陶符和圖形文，融會民族學的若干資料，從多角度追溯漢字演化的軌跡，探索原始時代漢字的結構和演進的歷程，說明文字起源的多元性及其與地區分布的交互關係，並與腓尼基字母、蘇美爾線形文等古文字作比較研究。指出

中國歷來統治者施行以文字控制語言的政策——「書同文字」，致使語、文分離，文字不隨語言而變化；而且漢字結合書、畫藝術與文學上的形文、聲文的高度美，造成漢字這一枝葉蔥蘢、風華絕代的大樹，卓然屹立於世界文化之林。而文字、文學和書法藝術的連鎖效應，則構成漢文化的最大特色。進而揭示漢字在未成形的初期，陶器上大量的線性符號多與腓尼基字母相似，類似於西亞早期的線性圖文。作者認為，古代閃族人在使用字母時，曾經嘗試過採擇彩陶上的符號來代替楔形文字的雛型字母，從而提出了具有原創性的字母出自古陶文的「字母學假說」，成為比較古文字學一個極其重要的命題。

《甲骨文通檢》是一部大型的甲骨文分類索引，具體編纂由沈建華負責，先生於每冊均撰有長篇的「前言」，闡述與各分冊相關的甲骨學問題。第一冊「先公、先王、先妣、貞人」，第二冊「地名」，第三冊「天文氣象」，第四冊「職官人物」，第五冊「田獵」。這些基本上總括了卜辭內容的所有類別。先生於每類幾乎都有新的發現和獨到的研究心得。如「地名」一項，先生發現《史記》只有「河渠書」而沒有「地理志」，但通過甲骨文通檢的編著，計得商代地名總數 1100 多個，又運用史籍文獻對勘的方法，對《夏本紀》禹後以國分封諸姓之地名作具體研究，從甲骨文中揭示並復原禹後地名構成的規律。又如，卜辭中有帝乙征伐人方的記載。但關於人方的地望，過去因受王國維、董作賓的影響，以為不出於黃河流域。選堂先生根據三星堆的出土文

物和相關的歷史記載，將人方釋為夷方，定位在現今陝西及西南一帶，大大地超出以往研究的地理範圍，這不但極大地擴大了殷商時代的版圖，而且對於西南地區的開發年代和文明程度也有極其重要的研究價值。

（二）

以上我們把選堂先生的生平和學術著作按五個時期作了粗略的介紹，從中可以看出，先生的學術活動和學術研究的範圍非常廣泛，涉及人文社會科學的許多領域。根據先生自己的歸納，其著作可分為敦煌學、甲骨學、詞學、史學、目錄學、楚辭學、考古學（含金石學）和書畫等八大門類。每個門類先生都細緻深入地做過大量的調查研究工作，並有重要的建樹。綜觀先生六七十年來的治學道路，大抵早年以攻治地方文獻為主，中年以後兼治四裔交通及出土文獻，大有創獲；壯年由中國古代的研究擴展到人類文化史的研究，晚年興趣逐漸轉移到印度和西亞，填補了中國學術史上不少空白。其成果則以開創性及文獻整理開路為多。關於選堂先生的學術成就，當代東方學大師季羨林先生在〈《饒宗頤史學論著選》序〉中分別從「地下實物與紙上遺文」、「異族古書與吾國舊籍」、「外來觀念與固有材料」三個方面作了高度概括。本文僅據筆者的一孔之見，試就選堂先生的治學特點略作補充。

先生治學，可以「博古通今，東西融貫」八字當之，先生自